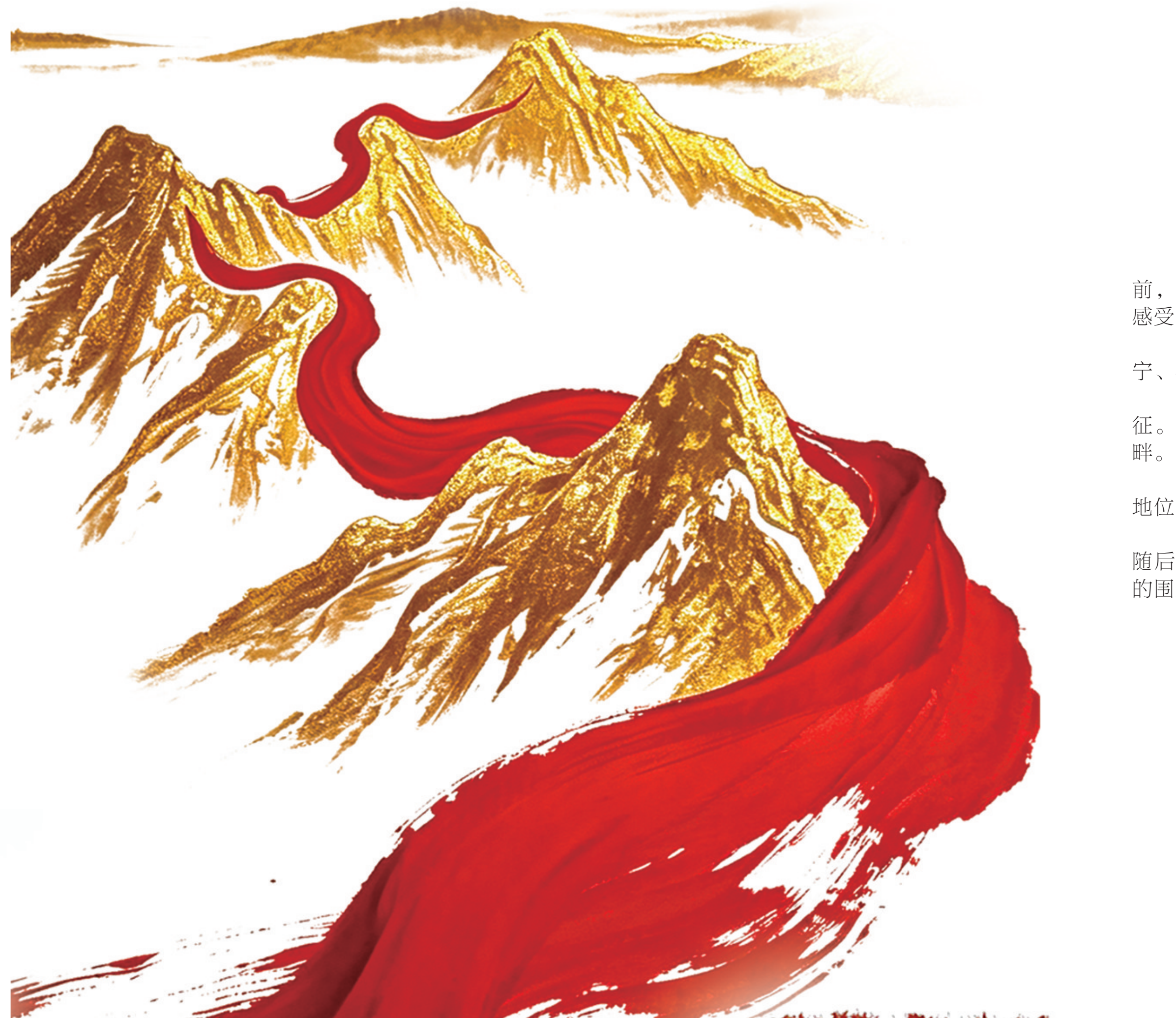
英雄史诗 伟大转折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特刊 1936-2026



为了伟大理想继续前行

本报记者　赵相康

深秋的赤水河，水色赭红，缓缓东流。

站在习水县土城古镇的老街上，青石台阶被岁月磨得发亮，四渡赤水纪念馆前，《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歌曲旋律余音未歇，一批批参观者沿着渡口拾级而下，感受90多年前那场渡河之战。两岸楼房林立，早已换了人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既是一次保存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又是肩负北上抗日使命的伟大远征。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战略转移中，红军命运的转折之战，正是发生在赤水河畔。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时，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仅3万余人，处境险恶。

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声东击西，从1月末到3月下旬四渡赤水跳出重围，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辗转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红军长征中翻过的雪山，仅海拔4000米以上的就有20余座。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娄山关激战身负重伤被迫截肢，用一条腿坚持走完长征。

支撑这支队伍前行的，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各路红军的旗帜，更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迅速发表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1934年7月，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始终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沿途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帮助组建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大同盟等组织。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军实力大大增强。8月，红军走进荒无人烟的松潘草地，遍地沼泽泥潭，稍有不慎便被吞没，6天6夜的跋涉中，许多战士长眠于此。

1935年9月，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毛泽东等人从收集到的报纸上得知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北上部队在这里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

9月28日，这个重要决定传达到陕甘支队连以上军政干部。毛泽东登上主席台，向1000多名军政干部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毛泽东充满激情地作动员讲话，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吴起镇（今吴起县），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0余个省。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将台堡（今宁夏西吉）。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宣告了肩负着民族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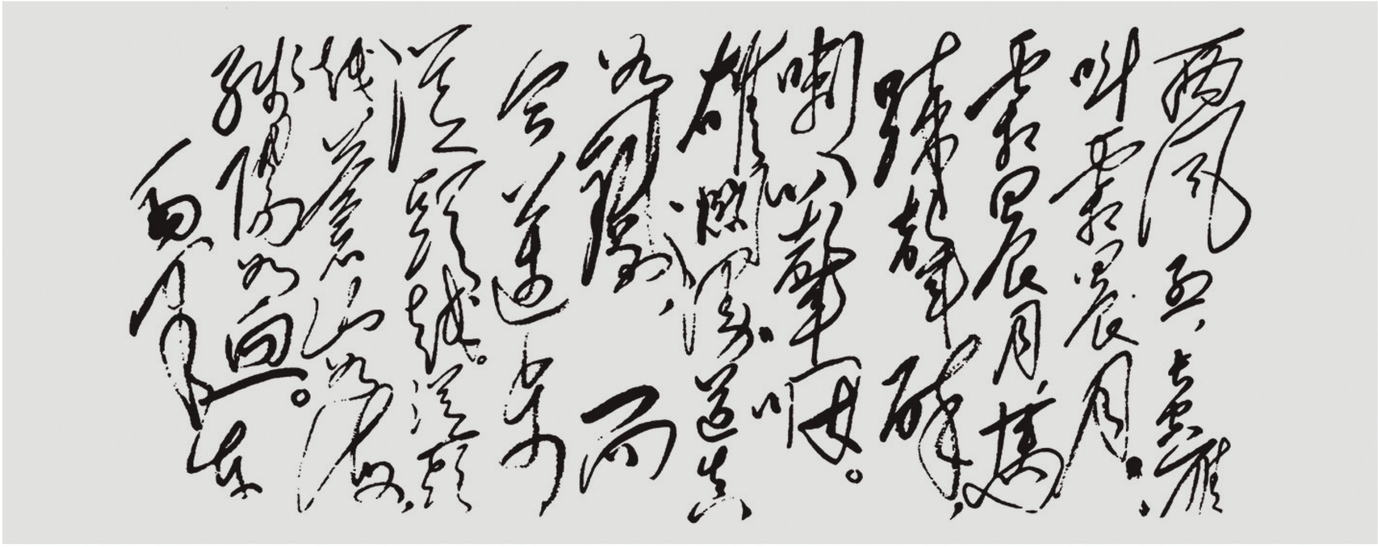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这支从绝境中走出的队伍，把民族救亡的旗帜高高举起，投身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洪流。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事实证明，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90余年过去，赤水河依旧奔涌向前。渡口旁，年轻讲解员一遍遍讲述长征的故事；纪念馆留言墙上，写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心声。

当年，红军为了伟大理想走过万水千山；今天，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继续前行。



娄山关石碑镌刻的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手迹。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一十八师五十四团军旗。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

长征在贵州的『第一次』

本报记者　陈江南

90年前的秋天，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等地成功会师，标志着这场伟大的远征胜利结束。其中，贵州作为红军长征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创造了长征史上一连串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次。

首个第一次，发生在贵州省东南部的黎平古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召开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的北上湘西计划，确立了向贵州转兵、挺进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瓮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开阳茶山关等渡口强渡乌江天险，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防线。强渡乌江，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较大胜利，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1935年1月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遵义三中操场隆重召开，大会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共25人。会后，通电全国，宣告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黔北第一个工农红色革命政权诞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宅邸召开。这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1935年1月，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鼓励全体党员要在白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由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它使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完成二渡赤水的关键行动，回师黔北。24日占领桐梓，25日奇袭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红星》报写道：“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

首次真正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明确冠以“长征”之名的官方文献，目前所见最早为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布的《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亦称《告工农劳苦群众书》）。开篇即写道：“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长征”这一称谓，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正式公布，用以指代自江西出发以来的千里转战。彼时中央红军已跋涉数千里，征途之遥，足堪“长征”二字之重。

1935年4月，中央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进入安顺的民族地区。4月16日，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与布依族领袖陆瑞光在弄染寨签订“反蒋作战协定”，史称“弄染结盟”，这是红军长征中与地方少数民族签订的第一个政治盟约，也是红军争取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事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长征在贵州开创的第一次，还镌刻在红军会师的历史篇章里。1934年夏，由贺龙等人率领红三军进入黔东，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同年10月，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抵达印江县木黄镇，与红三军胜利会师。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会师，为后续红二、红六军团的整合与共同战略行动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会址。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

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图。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

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

茅台渡口。资料图片

位于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木黄镇的木黄会师纪念碑　铜仁市委宣传部供图

民族危亡之际，高举抗日旗帜

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

本报记者　曹雯

民族危亡之际，谁高举抗日旗帜，人心就向谁凝聚。

2026年秋，毕节市七星关区和平路74号的一座老宅，门墙斑驳。风过门楣时，仿佛仍能遥见90年前的灯火灼灼——“毕节抗日救国会”和“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宅子的主人周素园，后来成为这支队伍的司令员。1936年2月的毕节，春寒料峭，却因一面高高飘扬的抗日旗帜而滚烫。

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在石阡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发动工农群众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取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地方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一致抗日提供了政治方向。

2月初，红军抢渡鸭池河，连克黔西、大定（今大方）。因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早已在毕节建立党支部、联络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3支地方武装力量，当红军抵达头步桥时，在席大明部引导下顺利进占毕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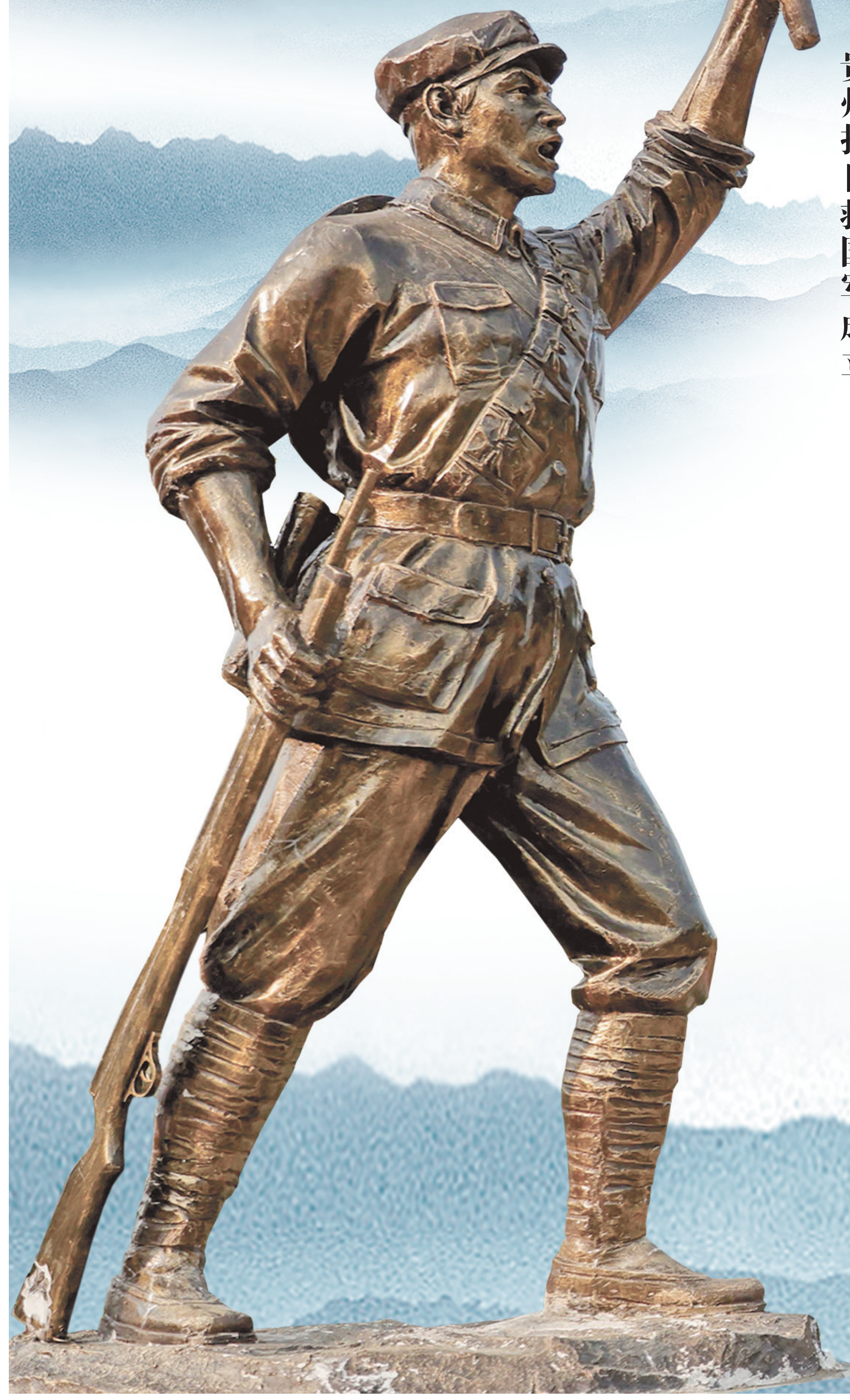
这不是偶然。毕节地下党掌握的3支地方武装，早已在等待一个共同前进的方向。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宣布成立——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一支省级抗日武装。由周素园任司令，邓止戈任参谋长，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分任支队长，红二、红六军团总部抽调干部担任支队党代表。

从旧官绅到民主人士，从地方首领到普通民众，能拧成一股绳，靠的是“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的施政方针，把抗日变成最大公约数，也把人心聚成洪流。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迅速组织“抗日救国委员会”“抗日救国团”等团体，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周素园凭地方威望奔走宣传，短期内队伍壮大，川黔边各派反蒋势力陆续与红军接洽。黔西北掀起参军热潮，父子、兄弟、夫妻争相参加红军，黔大毕根据地参加红军者达5000余人，成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扩红最辉煌的记载。

数字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他们未必都懂得高深理论，却懂得，日寇压境，山河破碎，谁真心抗日，谁就值得追随。

2月底，敌军压境，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毕节。周素园、邓止戈率二支队跟随红军战略转移，行至赫章平山铺时被编入红军，北上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奔赴抗日第一线。第一、三支队留守黔大毕根据地，与当地其他反蒋武装并肩战斗，牵制敌人追剿红军。第三支队坚持游击战，6月8日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共1300多人，在川滇黔边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声威大震，一直坚持斗争直至毕节解放。

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刘毓麟看来，“贵州抗日救国军彰显的是，红军长征沿途建立的信任和凝聚的人心。有人把这份信念带向远方，有人让它在当地扎根。红军主力继续前行，而同人民建立的联系，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



黔东南州施秉县白垛乡红军步道雕塑。磨桂宾　摄　（影像贵州）

专访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朱仁印：

贵州是长征精神孕育形成的沃土

本报记者　赵相康

记者：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从您的研究来看，贵州段的长征为长征精神注入了哪些内涵？

朱仁印：贵州是伟大转折发生地，是长征精神的淬炼地、成型地之一。红军在贵州的这段征程，是长征精神走向成熟、基本形成的关键转折阶段。长征初期，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下，红军陷入巨大被动，特别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付出极大牺牲。1934年12月，黎平会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从转兵贵州开始，经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系列会议，赋予长征精神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革新的政治灵魂；四渡赤水等军事行动，注入了机动制胜、绝境求生的斗争智慧；红军与贵州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了长征精神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贵州段的长征，体现出的精神内涵有：一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格。遵义会议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了党和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二是实事求是、机动灵活的斗争智慧。从转兵贵州到四渡赤水，贯彻实事求是、敌变我变。不固守预设路线，随时调整战略，在极端劣势下寻找战机、跳出重围。三是坚定信念的革命乐观主义。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不能消灭的，是不能战胜的。会后，在崇高理想指引下，党和红军胜利到达了陕北。四是严守纪律、植根人民的价值底色。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废除苛捐杂税。各族人民冒着生命支援红军。长征不只是军事转移，更是一次赢得民心的远征。五是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党性修养。在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中，党内开展严肃但团结的斗争，坚持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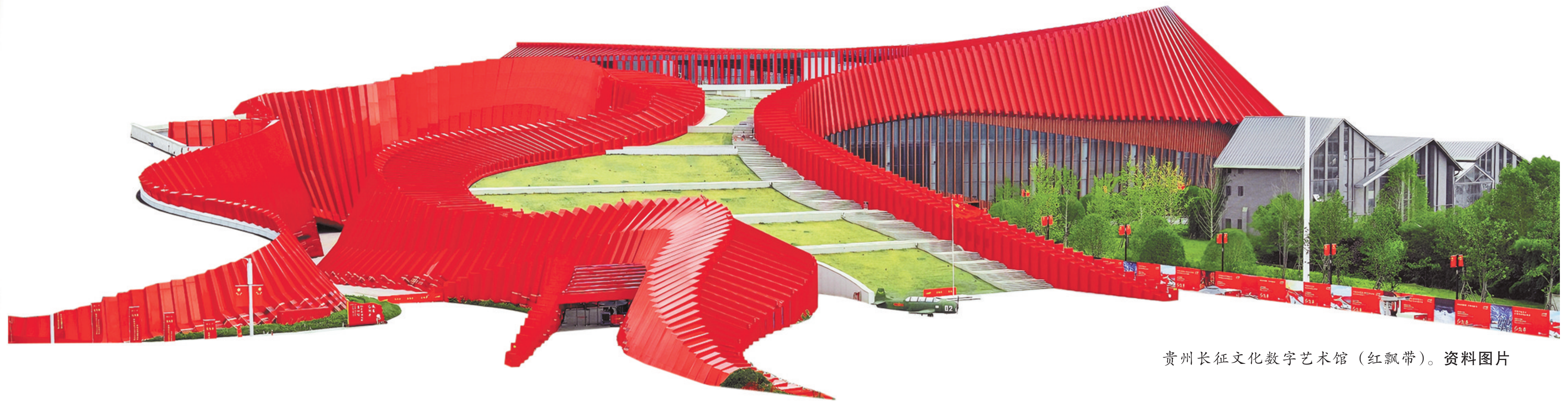
记者：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展现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结合在贵州的这一段斗争实践，如何理解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内核？

朱仁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红军在贵州绝境中，用会议抉择、战场搏杀一步步实践，最终确立起来的思想原则。湘江战役后，敌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面对残酷现实，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不再固守原定方案，实事求是研判敌我态势，果断采纳转兵贵州的主张，放弃去湘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军。这是实事求是调整战略，迈出独立自主第一步。猴场会议再次重申黎平会议决议，明确规定：重大军事问题必须经过政治局讨论，限制李德、博古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从组织层面纠正个人独断、脱离实际的指挥模式，为独立自主解决路线问题扫清障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受到共产国际干预的重要会议。会议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就是把“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转化为战场上鲜活的军事实践。红军作战不固守固定行军目的地，不追求死守某块地盘。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四面围堵，依托贵州山地、江河地形，随时研判敌军调动，敌变我变。不被敌人的部署牵着鼻子走，自主创造战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记者：红军转战贵州期间，严守民族纪律和各族群众结下深厚情谊。这段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历史，怎样丰富了长征精神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要义？

朱仁印：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转战贵州期间，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边进行艰苦卓绝的行军打仗，一边全心全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党和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铲除贪官污吏，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基层政权、帮助穷苦群众翻身解放，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真正把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贯穿于实际工作中。正因为党和红军在自身处于非常危险境地的关键时刻依旧心里想着人民群众、心里装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同苦、为人民而战，才能获得人民群众这个“真正的铜墙铁壁”的全力支持、真心拥护、热心帮助，才能使党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可以说，红军长征史就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段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伟大长征精神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资料图片

创新表达讲好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赵相康

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从革命老区到发展热土，循着红军足迹行走贵州，或踏上充满历史印记的长征步道，或走进精心设计的红色纪念馆，或欣赏一台跨越时空的红色演出，红军冲锋的号角声，仿佛依旧回荡在奔腾的乌江、雄伟的娄山关与赤水河谷两岸……历经90余载变迁，长征中的伟大转折故事，毛泽东笔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壮阔意境，在贵州山水间熠熠生辉。

红色资源串珠成链

黔东南至遵义，串联起红军长征从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强渡乌江，再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红色故事也在这条路线上生动呈现。

瓮安县永和镇观塘村的陡峭山崖，过往行人耳朵几乎擦着崖壁才能通过，因而得名“擦耳岩”。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曾由此突围。如今，擦耳岩行军线路保存完好，当地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一条长约10公里的连接猴场会议旧址的长征历史步道。

赤水河畔，160公里的红色沥青自行车道随着河谷蜿蜒延伸，串联起茅台镇、土城古镇、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地标。骑行途中，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灵秀交融共生。

作为重点建设区，贵州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不刻意造景，不粗暴翻新。如今，遵义会议会址在展陈提升及环境整治上蜕变，让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等与老街交织成韵，令人仿佛置身于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场景中。

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座中西元素混搭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会址东侧的老槐树是见证这场会议胜利召开的唯一“活文物”，因其“V”字形长势而被游客称为“胜利树”。

遵义会议召开时，朱德夫人康克清就住在会址的二楼。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推开房间的窗户，就看到楼下有一棵小小的刺槐树。”多年后，正是通过这一信息，才进一步确定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地点。

2003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找到在遵义市林业局工作的张本光，希望他能为这棵槐树做治疗，并定期检查。此后的20多年，在这位“树医生”的照看下，老槐树枝繁叶茂。

从展陈提升到环境整治再到长征历史步道铺设，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格局，将散落全省的红色点位逐一梳理、串珠成链。如今，贵州正以“绣花功夫”推进每一处红色项目，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设区的“四梁八柱”已然构筑。

方寸旧物见证转折史诗

遵义会议陈列馆内，一台“1:1复制”的老式军用无线电电台，是烽火岁月里无声的功勋战将。

湘江血战之后，正是这台昼夜不歇的电台，支撑中革军委二局战士破译层层密电。此后，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等战役，红军一次次跳出敌军重兵包围圈，皆依托精准的密码破译与情报研判。

穿越90余载时光，这部陈列在纪念馆中的电台，诉说着红军生死博弈、险中取胜的峥嵘往事。

展馆深处，红军标语拓片、纸质借据、行军水壶等寻常旧物，串联起鲜活的红色记忆。泛黄借据记载着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初心；斑驳标语是红军唤醒民众、军民鱼水的温热印记；残破行军器具则见证着红军千里转战的风雪征程。

兴义市威舍镇发哈村与云南毗邻，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此进入云南。发哈村的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国家三级文物红军马鞍。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威舍时遭到敌机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不幸被敌机击中，被紧急转移至当地余姓人家抢救。余姓父子见红军战士们纪律严明、态度谦和，连忙拿出家中的食物热情接待。

“红军离开后，爷爷和父亲在打扫院子意外发现一副遗落的马鞍，擦拭干净血迹后便收藏起来。”90岁老人余伦启谈起他在爷爷口中得知的那段往事时依旧情绪激动。

2021年，发哈村被选定为全省首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启动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威舍战斗展示园。余伦启家将五代人守护的红军马鞍无偿捐献给陈列馆。他说：“把马鞍交给政府保管是希望它能向更多人讲述红军故事。”

近年来，贵州在长征文物保护修缮方面始终秉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原则，实施长征文物保护修缮项目，让散落在黔贵大地的红色遗址遗迹得到系统性保护。

生动立体讲述长征故事

位于贵阳的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与遵义《伟大转折》剧目组成的红色文化演艺“双子星”，成为当今贵州讲好长征故事的时代表达。

“红飘带”位于贵阳龙洞堡机场一侧，是一座造型如飘带、气势恢宏的红色建筑，被许多外地游客誉为“体验贵州红色之旅的第一站”。

步入“红飘带”，随着《伟大远征》的演出大门打开，全息影像勾勒出红军战士的身影，瞬间将人拉回长征岁月。

站在“湘江”岸边回望惨烈“围剿”，坐在革命先辈身边“参与”长征论战，穿梭奔跑在“枪林弹雨”间，四渡赤水的炮火在耳边炸响，雪山草地的风雪触手可及，全域行浸式通道构建起多感官烽火时空，风声、水声、枪炮声、呐喊声层层交织。一个个真人扮演与数字影像交织的长征场景，让人热泪盈眶。

走出剧场，留言墙被便利贴贴得满满当当。“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进步”……游客和学生们的留言组成一道暖心墙。

“红飘带”自2023年底试运营以来，累计演出2万余场，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长征组召集人、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卫防评价：“红飘带”用中国科技美学讲好红色故事。

“红飘带”铺展了万里长征的恢宏长卷，遵义实景演艺剧目《伟大转折》便是聚焦“转折”故事的工笔特写。

《伟大转折》剧目演出场地毗邻遵义会议会址，演出首创360度环形空中舞台，搭配全息幻影、9D环绕声场与动态舞美矩阵，让观众仿佛置身历史。

在“红飘带”项目总导演、《伟大转折》剧目艺术总监王志鸥看来，红色文化演艺“双子星”的创新表达只为唤醒人心深处的敬畏与共情。

从展馆修缮到文物展陈再到红色文化数字演艺，贵州以创新思维推动红色文旅融合，让红色文化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记忆，而是可体验、可参与、可分享的生活日常。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版式设计：赵怡　王子琪　张睿